

● 长篇历史小说 ●



非台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大宗遗事

下卷



道家者流 木索楚楚 君子服之 道還是與
虛白之室 可以居處 華胥之庭 可以步武
豈無青紫 寵為尊主 豈無狐貉 踰為楊府
重此如師 畏彼如虎 摧陽之孫 無吝於祖



道家者流 木索楚楚 君子服之 道還是與
虛白之室 可以居處 華胥之庭 可以步武
豈無青紫 寵為尊主 豈無狐貉 踰為楊府
重此如師 畏彼如虎 摧陽之孫 無吝於祖



大宗遗事

下卷

长篇历史小说

◎

非台 著

◎

河南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第七十三回	949
议贡举乍开一锅粥 察言论自见是非心	
第七十四回	961
薛师正发运使江淮 王乐道仕宦绝京都	
第七十五回	975
报不平义士勇赴死 判峻刑阁臣忍违情	
第七十六回	986
迁皇弟太后动雷霆 上谤书谏臣下狠招	
第七十七回	1001
航运承包纲船争气 货物均输奸商怨言	

第七十八回	一代之隔恍然千载 父子于贬犹如南北	1013
第七十九回	载舟覆舟法论青苗 成事败事暂行三路	1025
第八十回	空权柄彦国养病去 新台阁君实横议来	1037
第八十一回	韩子华帮衬督条例 吕惠卿廷争露峥嵘	1051
第八十二回	急事先办农田水利 双燕单飞馆阁州郡	1063
第八十三回	雄狮虽老尚能半吼 砥柱已立岂无一擎	1076
第八十四回	呈密折暗设生死局 复素书公开异同术	1091
第八十五回	重起事端攻三不足 再说天人献洪范传	1101

第八十六回	另排座次越俎代庖 独占鳌头拥政为先	1114
第八十七回	惊纷纭倒戈报桃李 兴甲兵梦吃清君侧	1126
第八十八回	惧西风黄叶落披离 知谏院庶子遭诬蔑	1137
第八十九回	倚老卖老大官抗法 用智吃智小官弄险	1150
第九十回	倒赤帟离京三缄口 逢机运得巧连升官	1163
第九十一回	立保甲图长治久安 惊民变兴断指之谣	1178
第九十二回	老祖母忍辱做新娘 慈亲父含恨归九泉	1193
第九十三回	官利民利原非一利 势异心异难好两头	1204

第九十四回		1219
	撤州并县精简官吏 高薪养廉重法治贪	
第九十五回		1230
	胜复败再被老梦魇 攻为守重弹旧曲调	
第九十六回		1245
	诚先忌远人咸来服 礼后兵熙河皆归国	
第九十七回		1257
	用才唯大何烦小节 平蛮在策且须怀仁	
第九十八回		1269
	草泽民议建市易司 层檀商演说化外事	
第九十九回		1283
	方田均税知难攻坚 倡言惑众注孤掷狠	
第一百回		1297
	上五事总结话新政 伴君驾观灯见罅隙	
第一百一回		1311
	恶浪滚滚帝心浮动 危势岌岌师臣避位	

第一百二回	停新法举国惊回头 荐继任出阁做知府	1326
第一百三回	再奉诏重返政事堂 叹睽违分手同道情	1340
第一百四回	心衰力竭归老白塘 尧是桀非难忘余习	1356
第一百五回	显孤忠逆流进大狱 醒春梦神游赋赤壁	1369
第一百六回	纸上谈兵徐禧败绩 金殿哭师神宗病笃	1386
第一百七回	英年帝晏驾难瞑目 十岁儿登基重摄政	1400
第一百八回	遣老倒算江山变色 哲人永逝天地同悲	1414
后 记		1432

第七十三回

议贡举乍开一锅粥
察言论自见是非心

安石的改革前提，是人才的陶冶。做了参知政事之后，他虽然不能不优先考虑亟待措置的一些事情，却也始终没有放弃这个问题。差不多就在派出使者巡视全国的同时，贡举改革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范仲淹。庆历新政，他提的十件事中，第三条不就是精贡举吗？可他这个改革，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州县办学，有名无实，有的甚至干脆停办了；而考试科目的改造，也在一年之后完全复了旧。只有太学改造，多少有些成果。庆历的贡举改革虽然失败，但范仲淹的思路却是大体正确的。兴办学校与改变贡举考试科目，仍然不失为科举改革的两条基本途径。这一点，安石在《万言书》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

目下最好当然还是先办学，让所有的人才都由学校选拔推荐，再参加贡举考试。可学校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办好，由学校选拔推荐人才，更非一朝一夕的工夫。要想立竿见影，只能先改革旧的考试制度。

大宋的考试制度,承的是唐制,主要有常科与制科两种。制科是特殊考试,对象都是经过举荐的特殊人才,考试的时间、内容都没有一定之规,由皇上根据需要临时决定。庆历期间很活跃的那个余靖余希古,不是被人举荐参加制科,又被否决,还挨了知州一顿板子,闹出许多是非吗?苏轼兄弟后来也参加过制科考试,还考中了。常科,就是一般的进士与诸科考试了。先要由地方推荐,在州县考试中被举荐后,才能进京考试。它的考试时间与内容,都有明文规定。按规定,进士要考诗赋,兼考论、策及帖经、墨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三礼、三传、明经等,主要考帖经、墨义,检查考试者对于儒家经典著作的掌握情况。

什么是帖经、墨义呢?帖经,说白了,不过就是经典著作的填空而已!找一段经书,掐头去尾,让你填上空出的那一部分。墨义呢?就是从有关经典著作中找出一句或一段话,要你答出它的意思。与帖经一样,只要能背就行了。不同的只是,它除了要背原文,还得背下相关的注解。之所以叫墨义,原是与口义相对应的。口义就是口答经典问义,后来被取消了。

在唐代,进士考试先是只考诗赋,别的一概不考,后来才渐渐加上了策、论。又因为考策、论的时候,有些人信口胡说,有人建议应当检查参试者对于经典的熟悉程度,就将诸科考试中用的帖经、墨义办法,也用到进士考试来了。

这种考试制度的弊病,几乎可以一目了然。范仲淹看得清楚,安石更透彻。他设想的改革,也比仲淹更彻底:一是完全废除明经等诸科考试,只留进士一科取人;二是进士考试,只考经义、论、策,再不考什么诗赋、帖经、墨义;三是增加新的实用科目。但这是大事,首先,当然得报请皇上批准;其次,还得广泛征求朝野的意见,以便使改革更趋合理,也好达到最广泛的共识。

中书几位意见大体一致,将兴办学校与改革贡举分两步走的大

致设想，报告了皇上，请朝廷下诏广泛征求意见。皇上也同意，便下诏向相关官员征求意见：请他们务必在接到诏书后的一个月之内，将意见上报朝廷。

这是露脸的事情，因为具体，也相对较为简单。凡有权参与意见的，都争着说话了！

司马光自中进士到当考官，见得不少，对目下的贡举制度自然多有不满，甚至还不只是不满，简直深恶痛绝。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古至今，取士之弊再没有比现在更坏的了！

他当然有自己的理由。

原来他看中的是古代的举荐制度，根本就不赞成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在他看来，三代取士，全都以德行为本，并不看重文辞。到汉代，虽有考试，但茂才孝廉等科还是靠的推荐，仍是品德第一。所以，那时尽管朝政一塌糊涂，但下面的民风还是很淳厚的。即使到魏晋及魏晋之后，风俗大变，浮华衰败，但九品中正制的取士制度讲究品德第一，仍然卓有成效。读书的人，谁都不敢胡来。只有隋唐兴起科举制度之后，只以文辞取人，被取者的操行品德才一塌糊涂，不堪入目了。现在要改革考试制度，实在是千载一时的绝好机会，得抓紧办。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当然是恢复古代的乡里推荐制度，将品德好的人推荐上来，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杜绝科举制度的一切弊病。他特别强调，这推荐只能由乡里的贤人官长等来实施，绝不能让州县的官儿去掌握。因为州县太大，他们根本没法儿全面了解情况，只有乡里根生土长的那些人，才真正知道实情。除此之外，也不能让京城的那些考官来全权品评参试者的操行，再决定他们是否考中。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只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更要坏事。当然，就是乡党，也有看不清的时候。一个人的德行，不是那么好看的。就连家里的人，整天生活在一起，往往都有走眼的时候，何况别人？那么，究竟怎么办呢？

品德第一的原则绝对不能改变,只好将推荐的人改一改了。司马光的办法,是请京朝官来推荐。品级不同,可以推荐的人数也有所区别。官越大,推荐的人就越多,当然也要有限度。推荐不当,循私舞弊怎么办?可以加强监督,实行连坐。处罚一重,相信就没人再敢乱来了。

凡被推荐的人,朝廷一律以举者多少决定是否入选。一旦入选,就无需再参加州县考试,直接进京参加进士或诸科考试就行了。关于考试,他倒也赞成取消诗赋及帖经、墨义,只考经义、时务策问。

保举法是首选。如果朝廷觉得不合适,那就该退而求其次了,就是办好学校,从学校取人。他对庆历以来州县学校有名无实,极为痛心,要求加强学校的建设管理,配备能真正为人师表的专职教授,对学生也要加强约束,实行严格的考试、升级等学籍管理制度。

神宗拿着司马光的奏折,问安石:“司马光的这道折子,爱卿觉着怎样?”

“关于保举,说得有些迂,也不尽符合实际。学校与考试的建议,倒都是好的。”安石如实回道。

“保举的问题,在哪儿呢?”神宗想更进一步听听意见。

“陛下,保举推荐制度,由来弊端丛生。东汉有一首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将那汉代保举制度的弊病,说得再生动不过了。魏晋以后的九品中正制度,通过所谓推荐保举,更将天下官吏禄位,全让豪门贵族独占了,出身低寒的人,竟连一点儿上进的机会也没有!晋朝刘毅有一句话,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最是贴切不过。隋唐科举,可以说是对保举推荐制度的最好纠正。虽然它自身也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但那也只是改进的问题,不能完全取消。完全取消,取人也就没有相对公平的标准了。”

安石说的也是故实,却更实在,更具体,不由神宗不信:“爱卿说

得在理。这科举制度，大框子确实不能动，举人还得由州县考来。”

司马光的折子，虽然保守，不合时宜，还不失为一种建设性的意见。苏轼的折子，差不多就完全是唱反调了。

折子一开头，他就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而知人之法，则在于责实。假如皇上丞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那么，就是小官小吏里头也有的是人才，更甭说通过学校、贡举了。果真这样，如今的一切制度条令，就绰绰有余，根本用不着去改。假如皇上丞相没有知人之才，朝廷也没有责实之政，那么，达官大臣里面常常都找不到合用的人才，还想从学校、贡举里去找有用的人吗？要是这样，即使完全恢复古代制度，也多半是白搭，没用的。

苏轼毕竟不同凡响，不愧是做文章的高手，一开头就亮出刀子，将以变求治的皇上与丞相置于无法自拔的险恶困境：无论你选择什么，都只有失败一条路。承认自己是知人之才，用不着变；承认自己不是知人之才，变了也没用。正也好，反也好，就是不能变。

接下来，他就逐条驳斥他所听到的各种求变论点了。

先说办学。

未说之前，先是一段排比。说是时有可否，物有废兴。一件东西，要是应时而安，就是暴君也没法儿将它废了；要是到它合该被淘汰，就是有圣人出面，也不能让它恢复生机。所以，法制从来是随着风俗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就像治理长江大河，顺着它的走向因势利导，就能事半功倍；硬与它对着来，只能坏事。学校的事，也是一样。假如三代圣人活在当今，他们要选贤养才，也会由道而行，根本用不着学校。这意思自然不难明了。那些堂堂正正、无可辩驳的大话，不过是一种故作气势的比喻，意在强调，学校的兴废，根本不是人工能够扶持的事情，只能听其自然；而由圣人看来，学校是根本用不着的。

说过道理，他又摆出事实。学校不是没办过，庆历年间不是办过很多学校吗？当时以为太平可以转瞬而至，如今怎么样？不过徒有

空名而已！皇上要是真想办学，靠办学求治，必然要大兴土木，置官立师；而那些不愿接受教育的人，又必然会受到排斥，甚至驱逐。结果，不但会劳民伤财，还会引起纷乱，徒然叫老百姓受苦受累，何必呢？要是不想大动干戈，与庆历又没什么两样了。

说来说去，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维持现状，一切不动。他说得很明白：“今之学校，只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说过学校，他就说到贡举之法了。总的结论是，目下的方式，已经实施一百年了，治乱盛衰，根本与它没有什么干系，同样用不着改。凡认为应当改的几种主张，其实全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说只重德行，而忽略文章，就根本站不住脚。德行固然重要，但要立为科名取人，就只能叫天下人为着功名利禄都去作假了。上面以孝取人，勇敢不怕死的就会割股孝亲，胆小怕死的则要结庐墓旁；上面以廉取人，天下又都争着乘鄙车骑瘦马、穿恶衣吃恶食了。只要能叫上面中意，可以博取功名，就没有不能干的事情。这不是败坏德行吗？如何能做？

他最不满的，是专取策论而罢去诗赋，说得也最多。

首先，从文章而言，固然可以说策论有用，诗赋没用，但从治政的实际需要来看，策论实际上与诗赋一样，都没有用处。明知没用，为什么一直又用它们来考选人才呢？因为考试取人，不过如此，实在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是尧舜时代，也不免进人以言，试人以功。就是先看看他是不是善于辞令，再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而不只是嘴上功夫。这是有意矮化策论，将它与诗赋扯平，各打二十大板。既然两个都一样，要抬一个灭一个，就没有道理了。

其次，靠策论定人，也很难立得住脚。说到文辞华靡，本朝怕再没有人能超过杨亿杨大年的了。可他的清亮耿直，也一样叫人钦敬。怎么能因为他文辞华靡，就不承认他品格高尚呢？同样，通经博古的，本朝莫过于孙复、石介了，但他们却迂阔怪诞、矫情自傲，很难让

他们从政。且不说他们，再远点儿，自唐代至今，诗赋好而又不失为名臣的，数不胜数，他们什么时候负过天下？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要将诗赋给废了呢？

策论就那么高明？不过是东拼西凑，临时剽窃，糊弄考官罢了，哪里有什么真才实学！它的弊病，较之诗赋，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硬将它抬那么高，也实在站不住脚。

连帖经、墨义，他也主张不必动它。不管怎么考试，都与理政没有多大关系，又何必厚此薄彼，而不网开一面呢？

能将反调唱得理直气壮，洋洋洒洒，不也是一种功夫吗？苏轼的文章就有那功夫，没理也能说出三分理，让你读来爱不释手，从容入彀中。何况，里面也不全是胡扯，甚至还夹有他自己的经历体会。他一考进士，二考制科，说是道非，讲古论今，纷纷不已，不过也是为了功名，在那里东拼西凑，鼓唇饶舌而已，哪有什么真学问、真见地！这一点，虽然直到老去才有了清醒的认识，可那时，潜意识里的自我反省，也不能说一点儿影子也没有！

读完苏轼的折子，神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恍然有所领悟。至于究竟领悟了什么，他也没去想，朦朦胧胧的。再读一遍，才发现苏轼原来是个反对派，兴学与贡举改革，他竟一样都不赞成，只说什么都别动才好！原来这样！这怎么行？他能将无理说成有理，而且还叫你轻易就信了，不能不说是他的能耐！而且，有些话也不都错。像诗赋不全坏，策论不全好，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的文名，是早就知道的。由这篇折子看来，果然不为虚传。应当见他一见。神宗当时就要内侍，传苏轼见驾。

“陛下，您为什么要召见臣下？”见礼之后，子瞻突然反客为主，问起皇上来。

神宗不禁吃了一惊。看着一团和气的样儿，竟还有些锋芒？先解释一下吧：“您的折子，朕已经看了。说的与别人不一样，也不无道

理,所以想请您来谈谈。”

“这么说,陛下就错了!”子瞻又劈头来了一句。

神宗一头雾水:“朕怎么错了?”

“做臣子的,无不都以皇上召见为荣。如今皇上并不真正了解微臣,只是凭着一个折子就召见我,这不是以言进人吗?传扬出去,恐怕人人都要找这空子钻了!”子瞻教训道。

初次见面,就给朕一个下马威?文人恃才傲物,矫情作态,就有这样的!刚刚不还说尧舜也要进人以言、试人以功吗?我因为言论召见您,有什么错呢?神宗一笑,也不去计较,只转口道:“好,朕喜欢您这样心直口快。身为馆职官员,都应当时时替朕想着治乱安危、成败得失,而且,还要想到就说,毫不隐瞒。”

“谢谢陛下鼓励。”苏轼也开始谦虚起来。

“除了贡举,对于朝政,您还有什么意见,欢迎您也直言不讳。”神宗说。召见的目的,本来就是想多听听他的意见。

“没有。微臣不敢乱言。”苏轼推辞说。

“不敢说,不等于没的说。不要有顾虑嘛!”神宗听出他话里有话,鼓励说,“不是说了吗?治乱安危,成败得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顾忌。尤其是当前的政治,有什么不妥当的,更要说!就是朕本人有什么不对,也都可以说,没有必要忌讳。”

既这么说,苏轼就不客气了:“陛下有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怕就怕陛下求治太急,进人太快,听言太广。孔圣人:‘欲速,则不达。’陛下要时时警惕才好。”

“能具体说说吗?”神宗问。

“陛下,这只是臣的一点儿直觉。要说,也只能说出一点儿印象。”

苏轼垫了这么一句,就滔滔不绝地说起他的那么“一点儿印象”来了:无非是刚任命的那些官员的是是非非——从王安石说到吕惠

卿、程颢等等，只对章子厚多少包涵了一点。

神宗硬着头皮听了几句，到底打断了他：“爱卿说的三件事，朕已记在心里，会好好考虑的。”

皇上既这么说，苏轼只好不再说了，又谈了几句别的，也就告退了。

神宗将苏轼的折子又转给安石看了，问他说：“爱卿看着苏轼的折子怎么样？”

“苏轼很会做文章，无理也能辩出三分理。”安石笑着说，“只是一较之事实，就很难说服人了。如今人才缺乏，思想不一，异论纷呈，不为别的，只为道德不能统一。要统一道德，只有办好学校。学校不是一时两时能办得好的，所以先得改革贡举。苏轼说，进士一科，虽然诗赋、策论什么都考，也还是得了许多人才，倒也不能算错。可那是因为除了进士，读书的没有别的当官路子好走，都一窝蜂拥到这儿来了。既都拥来了，还能没有几个有用之材？这并不能说明进士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动也不必动。人一生正当少壮的时候，不去讲究天下正理，学些切实有用的东西，只是关起门来平上去入，不是诗就是赋，能好吗？凭着这一身平上去入的本事，虽侥幸得了个一官半职，办起事情来却一窍不通，行吗？所以，说到败坏人才，再没有比这更害人的了。不改，怎么成？”

安石说到最后，多少有些调侃，神宗也笑了：“朕倒也这么想。不过，偏尽管偏，苏轼这人还是能够想事的，文章也是真好，很雄辩，不由人不入彀。”突然又想起那天他们还谈到用兵，就又补充说，“苏轼对朕说：‘用兵之道，先动的为客，后动的为主。为主的常胜为客的，为客的总是吃败仗。治理天下，也是这么个道理。皇上也不要先动，只能以静待动，应之于后，才能无往而不胜。’爱卿看着，他这话是不是有道理？”

“苏轼这话，倒也不无道理，就看怎么看。天下之道，有经有变。

他说的是道之经，而不是道之变。要想畅通无阻，总要通经达变才成。圣人治理天下，感而后应，合的正是道之经。就这一点而论，苏轼说得在理。可天下的事情，变化无常，不能拘泥固执，只用一种方式，必须随机应变才成。也拿用兵说，哪里都是后出兵才胜、先出击就一定失败？不过根据时势，权宜而行罢了！”安石很耐心地解释说。

“还是爱卿解得透彻。”神宗赞同说。跟着，又话锋一转，征询安石，“爱卿说这苏轼，给他件把小事试试怎样？”

“用人先试之以事，是应该的。”安石同意。

但究竟让苏轼做什么事，神宗并没有设想，这事也就搁下了。

过了两天，中书奏事的时候，神宗又想起这档子事，便问曾公亮：“苏轼奏对明敏，是不是弄件事让他试试？”

曾公亮想了想，苏轼不在官告院吗，也算是有职事的，还试什么？陛下的意思，显然是要将他升职？可目下哪儿人都满了，并没有什么空位子，只好实话实说：“陛下，目下朝廷没有空缺，京师暂时没什么事情好试。”

“让他到中书去修条例，可以吗？”神宗提出了设想。

修中书条例，是执掌中书文字的文秘官员，事关中书政事及政策条例的制订、发布等等，官轻位重。就文字能力而言，苏轼当然再合适不过。可他处处显山露水，爱独树一帜，与中书似乎很难配合，这位子能适合他吗？勉强用了，他自己处处别扭不说，没准也会误了中书的大事！

“就能力而言，苏轼去中书应该没有问题，可也有不利的一面。他个性强，又好说好动，未必能与中书步调一致。怕就怕经常与中书产生矛盾，那就要误事了。”公亮说出了心中的顾虑。

“爱卿怎么看？”神宗转过来又问安石。

“丞相说得有理。中书条例的事，烦琐得很，又牵动大局，责任重大，从来大官小官谁都不大愿意做。目下的事情，更难做了。我私下